



深度 六四·三十年

评论

吴祚来：当自由城邦遭遇末日帝国——六四幸存者眼中的今日香港

城邦的新生代与帝国的新极权遭遇，形成必然性冲突，问题在于，它所激发的，仅仅是一时的悲情？还是像六四一样，产生一场新的历史悲剧？

2019-07-26



2019年7月7日，香港九龙区反修例大游行。摄：林振东/端传媒

1949年后的中国，虽然名为“人民共和国”，但仍然是一个帝国形态，是传统帝国与共产体制的复合。天安门广场是帝国的广场，三十年前的“八九”一代抗争者获得了一个多月的占领，最终失败，自由的声音被枪声泯灭，广场归于沉寂。

而香港由于百年时间在英国治下，已拥有相对成熟的法治与自由，它是一个自由城邦，却不具有真正民主的政制。作为一个位于帝国南大门的自由城邦，它的幸与不幸，盖因地缘关系而注定，帝国的威权要扩张，必然挤压城邦的自由空间，通过消解独立法治，实现威权掌控。

而香港城邦的新生代要进入“价值主义”时代，自由民主法治是第一价值，并与生命人权价值相维系，城邦的新生代与帝国的新极权遭遇，形成必然性冲突，问题在于，它所激发的，仅仅是一时的悲情？还是像六四一样，产生一场新的历史悲剧？

近日李鹏去世，引发坊间莫名狂欢，但中共对他的讣告却令人不安，大陆主流媒体上多年不见的“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这样的政治定性又一次出现。中共高层不仅要六四血债让李鹏去背负，同时又一次利用其“屠夫”角色，对抗争运动中的香港进行威慑，这也发出不祥的信号。

中共高层不仅要六四血债让李鹏去背负，同时又一次利用其“屠夫”角色，对抗争运动中的香港进行威慑，这也发出不祥的信号。

抗争运动如何和平持续，如何把握节奏适时进退，直接关系到抗争运动的绩效与最高目标的达成。作为六四运动的全程参与者，笔者深知，当局最希望看到的，是暴力活动在城邦肆虐，为出动军队镇压找到口实，善良的人们不得不警惕、提防。

帝国与城邦：三个自由广场

在天安门广场悲剧三十周年之际，笔者作为六四幸存者之一，六月初在台北的自由广场等地参与一系列讲演与研讨，在活动中我多次强调，三十年前的天安门广场曾是一个“自由广场”，但失败了；而香港是第二期“自由广场”，它位于中国大陆的南大门口，正在沦陷中，香港人正在通过抗争，守护自己的自由，争取真正的民主；而台湾的自由广场（如其本名

所示）则是第三个“自由广场”，是已然胜利的广场，如果香港沦陷，台湾（作为更大规模城邦、或城邦国家）将退无可退，面临更大的考验。

如果香港沦陷，台湾将退无可退，面临更大的考验。

在相关的讨论中，我因此提出了城邦民主与帝国民主在抗争过程中的大不同，台湾的民主路径步步为营，分众抗争，尽管也是步履维艰，充满血泪，但路径正确，人们终于走到了自由的广场上，享受自由的空气。

城邦的自由民主法治制度一旦确立，难以逆转，而帝国正相反，中共建政之初，从宪法到政体，特别是政治协商与人民代表制度，一度体现民主共和的理念，但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共和国蜕变成为党国，从党国又退步到个人极权专政国家，甚至成为政教合一的领袖崇拜国家。在习近平当政之后，改革开放的有限成果又一步步被蚕食，普世价值被禁谈，公共知识分子、维权律师、敢言的媒体与媒体人被打压、迫害，失却生存的空间。

大陆的民主抗争运动现在看起来如此无望，几乎没有了抗争的空间，但不可持续的专政极权，也有其宿命的悲剧终结。帝国的倒退路径如此鲜明，但从苏联经验来看，其崩溃瓦解也在一夜之间，后续的问题就是如何重建民主法治。

香港城邦的抗争，日益成为对抗庞大帝国专政的一部分，也成为拖垮帝国的韧性力量。

在这种背景下，香港城邦的抗争，日益成为对抗庞大帝国专政的一部分，也成为拖垮帝国的韧性力量，如果说八九之时香港人对北京民主运动的声援支持是基于道义，那么今天香港人的抗争，既是当年民主运动的持续，更是在守护城邦的自由，对抗大陆威权、争取本地的民主。

反思三十年前北京的抗争运动，对比香港今天的抗争运动，也许可以得到经验，更能获取教训。



六四学运期间，天安门广场内的学生。摄：Chris Niedenthal/The LIFE Images Collection via Getty Images

退无可退，致命的抗争

八九一代的大陆抗争群体，是新生的、脆弱的政治力量（包括广场领袖在内的主体都是年轻学子），由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它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有效、有力的声援与支持，国际社会更无法对中共暴行进行有力反制（这与香港现在的情形迥异）。

与此同时，成人精英也只有非常有限的参与。而不公开直接参与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避嫌”，即有民主宪政意愿的成年知识精英们，不愿成为当局怀疑的、学潮或民主运动的“幕后黑手”。相比之下，四年前香港的“占中”争取普选民主运动，大学教授等成人精英们，公开站在前台，亮出底牌，与控制城邦的力量公开抗争，强势发出争取“双普选”的呼声。

当年北京的抗争者之所以能够持续在四十多天的时间占领广场，有多重原因：一是起因，学生与市民能够走上街头，是为中共的开明领导人送花圈，如果不是这一起因，抗争者不可能大规模上街。二是理性和平，抗争者持续如此长的时间，整个过程和平理性，甚至自发组织了纠察队，最重要的背景是中共高层内斗没有结束，无法动用军队暴力镇压，军队因抗争者全力阻止，无法大规模进城，双方和平僵持。

现在，香港是不是面临同样的危险？解放军就在香港城内外，之所以没有像对付北京抗争者那样悍然镇压，又是什么力量在无形制约它呢？只要解放军出动，场景还会与当年北京“六三”之夜一样恐怖。如果说当年军队无法进城、或迟迟没有动用屠城方式，是中共高层内斗没有结束，那么今天香港的背后，则是大国博弈，全球关注，北京有所忌惮，从而在雨伞上面支撑起一片有限的天空。

抗争运动的入场需要理由，退场也需要理由。

示威和平，诉求合理，为什么要离场？——身处局中的抗争者，似乎没有离场的理由。当八九学潮组织者在五月中下旬得知上层斗争结束，极左保守力量将祭出杀器之时，有关学生组织确有离场动员，但仍然有不少学生坚守，不为可能的镇压所畏惧，他们是抗争的另类“分众”。普众的大规模抗争，分化出“分众”力量。

而这种与普众相异的分众力量，在这次香港“反送中”抗争运动中也有出现，激烈者冲击立法院，是更年轻的决绝者所为，而现场理性的力量甚至有年长议员前往阻止，以保证整个抗争运动总体呈现和平性。近日我们看到，分众抗争正在蔓延到更多的区域，更多的人群。

大型抗议运动中，数百万计的民众能做到和平理性，已是伟大壮举，想做到精确一致的共进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大型抗议运动中，数百万计的民众能做到和平理性，已是伟大壮举，想做到精确一致的共进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普众有普众的进退，分众有分众的特殊方式与追求。正如此次抗争运动中被广泛提及的“兄弟登山，各自努力”，香港人能够理解运动中不同层次的追求。

当年北京当局不仅将民众阻止军队进城当成暴乱，甚至故意制造事端，颠倒时间先后顺序以制造假象，为屠城暴行找到借口。帝国抗争运动面对的专政当局，与城邦抗争运动中面对的城邦管理者，也有重大的不同。

1989年，北京乃至中国大陆形成的超大规模的学潮与市民抗争，不是反对一则条例实施，或者为胡耀邦历史地位正名，而是要解决“宏大”的政治问题（宪法上的言论结社自由、民主选举权要兑现），却被当局视为要颠覆中共的政权，而对当年统治高层来说，他们家族腐败也成为自身的痛点，这使他们感到某种恐惧——只要政权失控，他们面临倒台后的清算。所以，帝国统治者无法承受失败，因为后果不堪设想。

在八九年宏大的抗争运动中，也有很小的诉求：学生们组成了代表团，要求与当局公开对话、电视直播，要求当局收回对学潮“动乱”的定性。为抗争者退场提供基本的安全保证。而当局担心的是，具体的对话过程必然涉及政治改革、当局收回“动乱”定性，无异于自食其言，由此失去威权。对威权中央来说，退一步就得步步为退，直到退出历史舞台。致命性的后果推定，导致他们一步不退。

对威权中央来说，退一步就得步步为退，直到退出历史舞台。

反过来说，如果抗争者退一步，争取校园民主或县市级民主选举，是不是可能？但帝国转型的模式，一切都要中央首肯，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中间路线仍然可能被中共视为致命颠覆（例如现在大陆对维权律师的打击，多以危害国家安全定罪）。而对学生或抗争群体来说，连动乱的定性都不能解决，公开对话这样的胆量、诚意都没有，也就没有退出广场停止抗争的理由。广场的坚守必然持续，悲剧因此成为宿命。



1989年5月18日中国工人在北京街道游行，支持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者。摄：Catherine Henriette/AFP via Getty Images

而香港这样的城邦抗争，对城邦管治当局来说，难以出现无法想像的悲剧性后果。当局有恐惧与无恐惧，处置手段与方式，对待最后结果的心理预期，因此有天壤之别。

这一次香港人“反送中”抗争，只是影响了威权者的面子，对中共政权不构成致命威胁；争取“双普选”却是一条坎：双普选之后，香港政府更加独立，北京对其控制将被弱化。

**“反送中”抗争，只是影响了威权者的面子，对中共政权不构成致命威胁，
争取“双普选”却是一条坎。**

但其实当局应该明白，开明对待香港，不仅香港人会对大陆更有善意，对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也只有百利而无一害。那种观点认为香港“双普选”民主化，对大陆构成示范效应，恐怕是杞人之忧——韩国对朝鲜又构成了怎样的示范效应呢？而香港人持续的抗争，对北京越来越不信任、甚至充满敌意，这难道是当局希望看到的结果？

分众抗争的界限

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总体上和平理性，没有极端化暴力冲击事件发生。第一阶段是纪念胡耀邦，只是学生们向新华门送花圈时遭遇象征性冲突；第二阶段是争取民主自由，提出政治诉求，以及公开对话的具体要求；这一阶段是中共对抗争运动的“动乱”定性引发的，导致步步升级，从绝食到绝水抗争，相关部门的欺骗性对话，无济于事的广场探望，以及李鹏与吾尔开希的互相训诫，都使广场抗争运动无解。第三阶段，即等待与观望阶段，绝食绝水与大规模的示威均结束，大量学生回到校园，部分高自联成员继续占领广场，外地学生开始进京，成立外地学生联合组织，广场抗争疲惫地继续，“天安门民主大学”与侯德建等人的艺术表演，使广场不再像绝食绝水时那样悲愤，这样的方式如果说是引发中共屠城的原因，无法令人信服。

而对于中共强硬派来说，不用暴力流血方式来宣誓对专制的维护，不制造恐怖，就不可能使抗争运动完全平息。“六三”夜间军队进城，坦克与冲锋枪开道，激怒和平民众，造成流血悲剧，这正是强硬派所需要的恐怖效果。

军队入城可以有军事动员，而当年抗争者并没有整体有效动员，更不可能形成有力的对抗，国际社会更无法及时参与阻止与遏制，但广场仍然有和平的退出机制，最后时刻侯德建等四人与包围广场的军队谈判，广场学生临时投票决定退出，这何尝不是抗争运动的奇迹呢？四十多天里和平抗争，致命之时和平退场，仍然体现了决绝的抗争意志、以及对残酷现实的妥协精神。

刘晓波六三之夜在广场上“砸枪”行为，可以在广场运动史上大书一笔。一个人、一杆枪，也许可以在广场上产生悲壮对抗，但对整个和平广场带来悲剧性的后果也可以想见。相反，天安门城楼画像泼墨事件，即便是象征性行动，却无益于广场抗争，反而激怒原教旨红色权贵集团。民主运动应当有非常清晰的诉求，如果激烈的分众行为频繁出现，它会使公众的抗争被弱化，甚至会被引向歧路。

民主运动应当有非常清晰的诉求，如果激烈的分众行为频繁出现，它会使公众的抗争被弱化，甚至会被引向歧路。

三十年后的今天，香港的抗争者仍然面临严峻的追问：激进抗争者是否会把整个运动带向不可挽回的地步？如何看待冲击立法会、中联办和占领地铁等行动？所谓“分众抗争”，有没有界限？当年胡平所说的“见坏就上，见好就收”，对于香港有没有实质借鉴意义？

抗争者已然取得局部胜利，这便是送中条例已“寿终正寝”，港府想重新启动，事实上难以可能。那么，抗争者应当血性激情地冲击立法会、中联办，砸毁门户涂污墙壁与中国国家象征？还是动员更多的力量，加盟到普众抗争队伍中？切近的目标，是要特首取消抗争运动的暴乱定性，惩罚过当施暴的警察，追究元朗暴力事件的幕后力量等等；而韧性抗争与长期追求达到的目标，仍是“双普选”。

分众不妨各自寻找和平路径，譬如分工游说现有的立法委员或有影响力的香港知名人士，对话特首，组建国际游说团队，寻求欧洲与国际人权组织的支持，甚至要求与大陆当局就香港“双普选”问题进行对话。但分众抗争应该有自律、有界限，要与普众抗争相呼应，至于“见好就收”，如果没有“双普选”，香港人抗争恐怕难以收场。保持韧性、寻找路径，将考量香港抗争运动的小成果与大目标的实现。

保持韧性、寻找路径，将考量香港抗争运动的小成果与大目标的实现。

倘若坚守和平抗争轨道，或有悲情，但难有悲剧。如何避免悲剧发生、或抗争运动被中共军方遏止，这将体现抗争者智慧。

中国国防部在回应记者关于香港驻军是否会干预香港事务时，发言人搬出的是《驻军法》，其第3章第14条所谓“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实质针对的是香港大动乱、甚至走向独立，这是中共的底线。触碰其底线，是否能提升抗争的效果，达至目标的实现？还是更能激怒中共当局，使形势变得复杂、胶着、无解？

和平示威在城邦是合法的，国际社会也在密切关注，在此前提下，驻港部队不敢公然参与处理城邦事务。更为重要的是，城邦的和平抗争对中共当局与城邦本身，都不构成“致命威胁”，城邦抗争因此有可能收获有限的胜利。



2019年7月7日，有网民首次发起于九龙区大游行，表达撤回修例及暴动定性，撤销控罪，追究警队滥权及实行双普选等五大诉求。摄：陈焯輝/端传媒

真正的普选权事关城邦人的政治生命，否则自由与法治仍然难以有效保证，所以，城邦的抗争不可能休止，不可能有“退出机制”，只会有节奏进行，如何可持续、形成动员力，并达到预期的效果，考验城邦抗争者的智慧与行动力，也考验帝国的宽容度与开明度。

在送中条例被遏止之后，最重要的抗争诉求，要让北京与港府清楚，“双普选”并不是致力于独立，而是通过议会民主，使香港民意得到制度性的呈现，通过议会博弈，使城邦获得理性和平与文明繁荣。没有双普选政府，只效力帝国中央的政权，才是社会冲突与街头动荡之源。

帝国与城邦的价值之战

城邦守护自己，需要凝聚自身力量与国际力量支持，使帝国无法延伸掌控权，而城邦民主要进一步，不仅与上述因素相关，还与帝国的文明进步相关联。但可以肯定的是，城邦的抗争也许不会像北京当年那样出现悲剧，但却充满悲情。

相对于1989年，帝国与城邦都有了新生代，新生代意味着价值观的升级更新，也意味着价值冲突发生机率大增。

相对于1989年，帝国与城邦都有了新生代，新生代意味着价值观的升级更新，也意味着价值冲突发生机率大增。这当然不是说，帝国治下的年轻人与自由城邦的年轻人必然要发生冲突，而是说，帝国在新君主手中，而城邦的新生代要按照理想与价值生存方式践行。帝国的威权要进一步，必然会压缩城邦的自由与法治空间，而城邦的新生代要进一步，则是要通过“双普选”，使自由与法治得到民主政治的保障。

作为帝国统治者，习近平不仅放弃了“韬光养晦”的基本国策，对香港问题也呈威权扩张之势，邓时代强调的是“两制”，甚至乐观认为，五十年后香港的制度没有必要改变了，潜台词是：大陆五十年后应该与国际社会政制接轨了，一国两制也就不成为问题。但习时代强调一国，甚至不再承认中英联合声明的相关承诺，对香港的渗透与控制也步步进逼，甚至将书商、富豪直接绑架到大陆受审。

在这样的背景下，林郑月娥迎合中央旨意，拟通过“送中条例”使香港进一步受控于大陆，一旦送中条例实施，不仅香港公民，连途经香港转机的政治异见者、“颠覆政权者”，都会以莫须有的罪名送交中国大陆处置。

习近平主导下的中共，在香港问题上又走上了极左保守之路，对香港一直是“维持现状，充分利用”八字方针，对香港争普选严加抵制。

对于香港的年轻世代来说，“双普选”既是基本法的法定承诺，也是香港民主进步之必然。但原教旨马列主义者或极左中共派是体制内另一条主线，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并无改变，或者说习近平主导下的中共，在香港问题上又走上了极左保守之路，对香港一直是“维持现状，充分利用”八字方针，对香港争普选严加抵制，在雨伞运动与“反送中”运动中，管控大陆民众的信息也达到极致，重要城市开启“新疆模式”，在地铁口或大街上公然检查年轻人手机，虽然名为防范暴恐信息，但它真正防范的，是香港抗争运动的效应波及大陆，引发更大的抗争风潮。这种民主政治的恐惧，限制了他们在这场价值之战中的底线，使他们不能在香港“双普选”抗争中退让一步。



2019年7月1日清晨，在立法会外的示威者。摄：陈焯輝/端传媒

香港的命运在谁手中？

八九民运遭遇镇压之后，抗争链被恐怖斩断，国际也因冷战而无法有效制止暴行。相比之下，城邦的抗争运动则是幸运儿。不仅全世界都可以通过直播看到现场，全球声援与国际干预，也会直接影响现场。

林郑在中央支持下，只是表述送中条例提案终止，对自己的错误决策表示道歉，但没有收回对抗争事件的暴乱定性，没有答应惩处违规使用暴力的警员，更没有允诺释放抗争被拘人士。显然这种立场无法平息事态，如果要守在位置上，就应该将自己的决策错误揽下来，处置违规警员、释放被拘的抗争者，向市民表达诚意。显然，北京的政治意志正在左右香港特首，对警方违规的纵容、对和平抗争者暴乱的定性等坚决不改，与八九当年中共对待抗争者的强硬态度，如出一辙。

如果城邦能够成功抵制帝国的强压，至少可以获得暂时的和平安宁，甚至有机会改造帝国体制，赢得真正的长治久安。

如果城邦能够成功抵制帝国的强压，至少可以获得暂时的和平安宁，甚至有机会改造帝国体制，赢得真正的长治久安；相反，如果城邦屈从于帝国威权，那么后者就有更强的信心将其理念强加于更广阔的区域。但正如有评论所说的，这是习近平当政以来的第一次真正失败，或者至少是第一次遭遇重挫，因为他发现，在这个小小城邦之中，他无法予取予求地行使自己的威权。这也正是香港虽小、却意义重大的原因之所在。

美国主导的经贸战，正升级为一场国家软实力之战，而香港、台湾正处于在这场战争的前沿。这场战争不可避免地具有逐利色彩，在“修昔底德陷阱”的语境中，可以被视为另一场伯罗奔尼撒战争，但对于香港和台湾这样的自由城邦来说，亦是另一场希腊-波斯之战，一场事关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战争。

对城邦人来说，与生而来的自由法治权利不可让渡，而对帝国专制政权来说，没有威权与控制，帝国没就有了光荣与脸面。帝国与城邦之战，将是一场持久的软性战争。

香港的命运，现在正被看不见的手所管控；但最终，必然会在香港人自己手中。

（吴祚来，独立学者，专栏作家，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现居美国）

评论

吴祚来



热门头条

1. 721全纪录：示威者涂污中联办，上环警方开枪驱散，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
2. 大陆媒体如何报道香港反修例运动？
3. 周保松：自由诚可贵——我的微博炸号纪事
4. 谁拥有华为？
5. 元朗无差别袭击事件重组：警察在白衣人离开一分钟后到场
6. 京都动画和它试图对抗的两兆血汗产业
7. 中国网红“出墙”来：百万订阅数的YouTube频道，诞生在没有YouTube的中国
8. 《寄生上流》／《上流寄生族》：永远无法获得解决的难题
9. 华人富豪政治课：任正非和马云，指点中央可以到什么地步？
10. 沙田反修例游行后，警方大规模进入商场清场，警民爆发冲突多人被捕

编辑推荐

1. 第一部“没有缅甸的电影”，赵德胤的灼人秘密
2. 大陆媒体如何报道香港反修例运动？
3. 戴晴：“官迷”李鹏大手笔之二三事
4. 象牙塔之内，无人能独善其身——美国学者谈贸易战下的中美学术交流
5. 五问元朗黑夜：“预先张扬”的袭击与多次缺席的警力
6. 红色工程师李鹏的一生
7. 争议、折中与分裂——回看欧盟委员会换届的政治博弈
8. 元朗无差别袭击事件重组：警察在白衣人离开一分钟后到场

9. 吴昆玉：韩国瑜待拆的三颗未爆弹（二）——信任危机及两岸议题

10. 田方萌：“学伴”风波只是症状，病根出在中国教育界“洋跃进”运动

延伸阅读

六四三十年纪念研讨会首度移师台北，持续重访八九民主梦

六四三十年纪念研讨会，今年由香港移师，来到台北举行。三十年前，运动发生在冷战结束前夕，追求民主体制蔚为浪潮；今日，旧体制已面临不同挑战，而“新冷战”格局再度降临。有心与会者如何重访当年民主梦？

安徒：毋忘六四——三十年流亡及香港本土的记忆政治

六四记忆在内地、海外和香港几个不同的地方遭遇不同的本地脉络，自然有不同形貌和际遇，发展出不同的力量。然而六四作为伟大的反抗暴政时刻却是恒久不朽如一。

30年后，香港还能守住六四记忆吗？——专访李立峰

一边是讳莫如深，一边是恒常悼念，六四记忆在香港绵延30年，是一种必然？香港中文大学两位学者10年研究，揭示集体记忆背后的秘密。

一场“六四”悼念，四张不同的香港面孔

27年来头一次，六四纪念分化为四大团体四个场地。在对“六四与我”的不同诠释中，不同团体建构身份，也争夺群众。

第三种六四想像，挣脱香港困局

香港必须把天安门事件的意义，放到“香港 - 世界 - 中国”长时段的三边政经转型中理解，思索香港能在前途上采取的立场与战斗位置。